

中国现代革命史

学习参考资料

第4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山大学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室编

中国现代革命史学习参考资料

第四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目 錄

- 紀念“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發展二十五周年-----傅 鐘(1)
- 学习“中国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宋时揚(10)
- 永远注視新生的事物
 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筆記-----孙定国(18)
- “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紀念-----陈伯达(29)
-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論”-----人民日報社論(42)
- 实践論开辟了我們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人民日報社論(53)
- 論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論”-----苏联真理報編輯部(58)
- 毛泽东同志說革命的辯証法-----陈伯达(62)
- 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胡 繩(78)

附 錄

- | | |
|---------------------|-----------------|
| “八一”南昌起义 | 沈自敏(90) |
| 广州起义紀实 | 李藍天(95) |
| 海陆丰革命斗争概況 | 李藍天(104)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政权 | 荣孟源(109)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紅軍 | 荣孟源(119)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 | 繆楚黄(129)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查田运动 | 何全仁(141)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教育 | 賈維岩(155)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化战綫 | |
| 上围剿与反围剿 | 柳 叔(160) |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 | 汪敬虞(177) |
| 中国工农紅軍长征概述 | 繆楚黄(198) |
| 美帝是九一八事变的預謀犯 | 沈自敏(213) |
| 美帝是九一八事变的帮兇 | 沈自敏(219) |
| 九一八事变中美国“不承认主义”的鬼把戏 | 孙子明(226) |
| 帝国主义者在国际联盟中相互勾結反对 | |
| 中国人民与苏联的行为 | 苏联下塞沃斯基揚諾夫(235) |

紀念“中國的紅色政權

為什麼能夠存在？”

發表二十五周年

傅 鍾

“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一〕 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時候起，首先就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底反動統治，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革命政權的理論，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發表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就是他關於政權問題的輝煌論著之一。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答覆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個理論問題——關於紅軍和紅色政權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並確定了以武裝鬥爭為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和以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取得城市的革命方針。中國革命的實踐過程，充分地証實了毛澤東同志這一理論的正確性。

（一）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曾經處在一個極其複雜的環境和極其嚴重的時期。這時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從新建立革命的陣地，準備新的大革命並保證其勝利。黨的任務，首先就是受正確

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首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极其英明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他接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一）

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分析相反，陈独秀分子在革命失败后宣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因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资产阶级已经建立了并将巩固它的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放弃革命斗争，转入合法运动，以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分子由此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并走上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结合的反革命道路。

那么，当时的革命处在怎样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这是决定斗争策略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认定当时的革命是处在低潮，并以他自己亲身经验提出有力的证明：“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之低落。”（二）但毛泽东同志同时又预见到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并且会比较迅速地到来。他这个预则是由分析当时形势，洞察当时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发展的情

（一）“列宁文选”，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三页。

（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第二版（下同），第四九、五〇页。

（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〇页。

况而得出的結論。

既然革命是处在低潮，党的策略无疑地應該是退却而不是进攻。这就是說，党应当迅速收集革命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和防御。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领导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军，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策略}。但是，向井冈山的进军，不是单纯的退却，而同时是对反革命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巧妙地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表现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创造性的运用。革命力量向城市退却下系，在农村却展开了进攻；革命虽然暂时失掉了城市，却武装割据了农村，使农村成为退却的中心阵地，同时又是举行进攻的新方向。这种进攻的直接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贩卖革命的国民党，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进攻的道路是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認識相反，这时党内产生了第一次“左”倾路綫。这个“左”倾路綫由於不能正确認識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观地急於超过民主革命；在估計形势时仍然认为当时是革命高潮，把敌人估計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因此拒絕退却，採取了盲动主义的策略，結果使进攻遭受失败。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首先使全党同志对当时的局势有了清醒的認識，澄清了当时党内外的思想混乱，並指示了一个明确的斗争方向。

(二)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社会情况以及革命形势的分析，認定中国革命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

后，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因此，就必须制定一条革命路线，即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了，以及全党绝大多数同志遵循了这条路线，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条路线，同时也是建立红色政权的路线。但是在当时，能够自觉地理解和接受这条路线的同志还不太多。因此，当敌人第三次“围剿”临到井冈山的时候，党内有些同志就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对毛泽东同志对于军阀混战必将再起的预断表示怀疑。甚至当时的党中央也认为军阀混战不会爆发，要毛泽东、朱德同志将部队化小，本人离开部队到大城市去。毛泽东同志向这种悲观情绪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湘赣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接着又写了这篇文章有系统地作了理论上的回答。毛泽东同志扫除了那些怀疑和悲观情绪，坚定了全党的信心，在思想上武装了党，因而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一〕

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这个问题时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二〕

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在中国产生并能长期存在与发展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有如下几个主要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而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产生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因而使一小

〔一〕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二页。

〔二〕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八二页。

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圍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还遗留在中国广大区域的人民中；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继续向前发展的；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红军，而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有领导红色政权的组织坚强、立场正确的共产党。

基于以上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断言：“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一〕

毛泽东同志同时指出了党的指导之正确与否，对于红色政权的坚持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规定的策略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主力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二〕 这些策略之所以正确，完全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有正确的分析，善于区分统治阶级的破裂时期与比较稳定时期，善于区别不同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正由于有这些正确的策略，当时的边区政权才能够战胜敌人数次进攻，而且日益扩大。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篇文章中，对于建立红色政权的观念，也作了深刻的全面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在四围白色政权中能够长期存在（即反映革命的长期性）和发展的红色政权，必须包含着三个方面，即：农民土地革命；民众武装；革命根据地建设。这三个方面是密切结合，相依为命，缺一不可的。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

主要斗争形式；革命根据地，是党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这三个方面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总的完整的观念，就是“红色政权”的观念，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也就是“在农村聚歼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海城市”的观念。毛泽东同志巧妙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的问题。还须指出，这个总观念的形成和胜利，乃是毛泽东同志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同盲动主义与取消主义、流寇主义与地方主义作斗争并将它们克服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所必须了解的。

毛泽东同志极端重视当时新生的红军和红军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这是把中国革命引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大的因素。鉴于党内有些同志认识之不足，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又专门论述了这一点，并着重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三）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根据他的科学分析，规定了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建立革命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发动群众后夺取全国政权，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而是以武装建立小块农村根据地政权，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发展到取得全国政权，毛泽东同志理论的光辉照耀着中国革命，指引着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

（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一，五二页。

（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五三页。

（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页。

一切反对过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意见，都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十年内战时期中的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曾经反对与否定过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甚至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和“枪杆子主义”，认为“以农村来包围城市”是“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割据”是不可救的事。“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中国情况的特点，固执地以城市为中心，幻想全国一律平衡发展的革命，幻想革命一下子会在全国胜利，轻视和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农村中长期进行艰苦工作和斗争的主张，结果使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事实终于判明了谁是“极端错误”的，谁是完全正确的。

(三)

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能够这样正确和有巨大的指导力量呢？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解答。学习这篇文章，我们正应该从这方面得到极为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在决定一切策略步骤时，必须明确分析具体的实际情况，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忠实学生，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能手。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关于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以及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租税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事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

，特別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經驗的光輝的成果。”〔一〕

毛澤東同志分析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是理論和實際聯繫的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還在十年內戰時期，他就經常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又要求我們‘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二〕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社會情況及革命形勢，找出了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發展規律。這就是：‘由於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部互相矛盾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歷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同時又使這一鬥爭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矛盾，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

〔三〕毛澤東同志根據上述中國革命這一規律來指導中國革命，就規定了以武裝革命的農打邑圍並最後奪取反革命佔據的城市，也即建立紅色政權的這樣一條革命路線。這條路線既然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情況的科學分析，它就是完全符合於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唯一正確的路線。而一切錯誤的“左”傾和右傾的路線，既然不瞭解和違反了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它們就必然要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一〕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八八頁。

〔二〕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〇一頁。

〔三〕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九七三頁。

中国共产党遵循着毛泽东同志的路綫，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逐步过渡。今后中国人民的任务，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是要在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这个任务的规定，同样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经济情况出发，符合於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旧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是逐步在起变化的，但要根本改变中国这种情况，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和阶级情况是复杂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在今后一个长时期中还起着作用。党制定政策就必须从这种情况和特点出发。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告诫我们，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这个方法，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者所必须牢牢记住的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策略思想给我们作了一个典范。事实证明，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其其原因，都是由於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之故。

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策略思想，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纪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发表二十五周年应当得到的启示。

（选自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学习“中国的紅色政权 為什麼能够存在？”

宋時翰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的。这篇著作曾经像灯塔般地指引中国人民解决了中国革命到那里去、如何进行以及前途怎样等问题。直至今日，它仍保持着伟大的理论威力。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所指示的并为中国人民实现的道路，对于东方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此，这篇著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发动起来，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州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北伐战争迅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致使这个革命走到半路便被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所叛卖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首先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接着，同年四月十五日，又在广东举行所谓“清党运动”，野蛮地屠杀、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最后，同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的汪精卫派的国民党亦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向蒋介石投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便遭受了失败；从此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造成了全国反革命的白色

恐怖。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正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内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以后，到湖南东部组织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十月，他率领了秋收起义所组织起来的武装，到达到湖南与江西边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没有采取如南昌起义以后南下潮汕那样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如广州起义以后在城市建立政权那样的军事行动，而是看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看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看准了当时革命的主观力量和群众条件，选择了群众基础好、反动统

在力量薄弱、地形上有險可守而又可以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地区，創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到达井冈山以后，不是掩旗息鼓地隐蔽起来，而是坚决地大張旗鼓地和敌人斗争。即：創建紅色政权，反对逃竄主义；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红军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紮下根来建設革命的根据地。从这些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可以証明，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对于中国革命应当到那里去，应当如何做法等问题，已經考虑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採取这样的做法，是毛泽东同志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天才的表现。这是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斗争的类型的創造。毛泽东同志，只有毛泽东同志运用他精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通过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敌我情况、周圍环境科学的深刻的調查研究，得到了根据中国特殊情况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規律，並根据这規律，親自参加和领导了革命的实践，冲破了白色恐怖的氛圈，在井冈山上高耸的兩立起革命红旗。这面红旗的兩立，向反动派宣告中国革命沒有失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的；对全国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來說，則是树立了光輝的榜样；昭示着中国革命的前程，昭示了中国革命應該如何具体革法才是正确的，具体揭露和反对了‘左’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路綫，傑出地創造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正确运用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光輝榜样。此后，其他地方起义中組織起来的部隊，凡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路綫和政策，对这些武装部队实行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发展了起来；反之，就無一例外地遭到慘痛的失敗。毛泽东同志在这样革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出的这种大智大勇，充分地顯示出他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淵深的素养，显示出他革命領袖的天才。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彻底清除了反独

秀的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却坚决地执行了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发展了这次大会决议中的正确方面，并解决了大会决议中尚未解决或没有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充分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党员执行党的决议上创造性地作出了光辉的示范。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也就是在开始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一年以后。在这一年中，由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策略和政策的正确，根据地有了发展，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群众基础更形牢固；由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较前壮大并在从四月到七月的四个月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攻。但是，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错误地不顾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的反对

(当时湖南省委是边界特委的上级组织)，强使红军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红军遭受到八月的失败。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了一个营的部队去接应和会合南进的部队，在九月以后又重新打开了局面，恢复了边区，挽救了八月的失败。这一年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如果依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策略和政策办事，其结果就是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人民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反之，如果脱离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和政策的指导，其结果就是红军受到挫折，根据地缩小以至丧失，群众受到摧残。八月失败就是明显而深刻的教训。

当时在党内军内也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时局的估量和革命的具体道路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没有在湘赣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甚至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情绪，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因此，从理论上说明红色政权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统一党内、军内的认识，明确革命的具体道路，加强胜利信心，是一个迫切的课题。毛泽东同志恰合时宜地从事了这种理论工作，他科学地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了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之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指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